

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与国际组织 人才培养

彭 龙 | 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

DOI:10.16775/j.cnki.10-1285/d.2017.04.003

- ◆ 国际组织在处理国际事务和开展全球治理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已经成为制定国际规则、协调多边事务、配置国际资源的重要平台。
- ◆ 新形势下，推动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需要我们发掘中华文化中积极的处世之道和治理理念同当今时代的共鸣点，向国际社会贡献更多的中国智慧和方案。
- ◆ 中国要有效参与全球治理，必须打通国际组织这一关键参与路径，增强规则制定能力、议程设置能力、舆论传播能力和统筹协调能力。

随着我国“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和国际力量对比的消长变化，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正处于深刻变革的历史调整期。国家间经贸合作、政治对话依存程度不断加深，利益发展诉求也越来越强烈，国际组织在处理国际事务和开展全球治理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已经成为制定国际规则、协调多边事务、配置国际资源的重要平台。作为迅速崛起的世界大国，中国急需加强国际组织人才培养与输送，更多地发挥自身在国际组织中的影响力，拓展参与全球治理的有效路径，进而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合理的方向发展。

一、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合理变革是中国义利所在

长期以来，以西方社会主导建立起来的全球治理体系，推动了全球化的发展，在促进全

球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文明互鉴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历史性作用。随着贫富差距、气候变暖、恐怖主义、难民危机等全球问题和全球挑战的日益增多，全球治理体系中的西方中心、双重标准等不公平、不合理的缺陷也越来越显现，已经不能很好地适应世界发展新格局的变化。有西方学者曾指出，“如果人类再像西方过去那样以个人主义为中心，以无限进步、无限发展为最高价值，而不进一步对人进行超越而内在的反思，不对人际关系有一个全面而深入的理解，那么结局可能就是人类的集体自杀。”费孝通先生也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指出，“现在世界正进入一个全球性的战国时代，是一个更大规模的战国时代，这个时代在呼唤着新的孔子。”“新的孔子必须是不仅懂得本民族的人，同时又懂得其他民族、宗教的人。他要从高一层的心态关系去理解民族与民族、宗教与

宗教和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中国一直在为全球治理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积极推动全球治理理念创新。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指出，“70年前，我们的先辈以远见卓识，建立了联合国这一最具普遍性、代表性、权威性的国际组织，寄托人类新愿景，开启合作新时代。中国将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和国际秩序的维护者。”1945年6月，中国是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国家。1955年4月，周恩来总理在万隆会议上提出采取“求同存异”的方针成为指导现代国际关系建设的重要基础原则。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提出了在国际社会践行正确义利观、构建合作共赢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新理念，为全球治理和秩序重构提供了理论制高点。新形势下，推动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需要我们更加深度发掘中华文化中积极的处世之道和治理理念同当今时代的共鸣点，向国际社会贡献更多的中国智慧和方案。

二、国际组织是中国亟待打通的全球治理参与路径

自联合国成立以来，各种国际组织迅猛发展，从专门性到普遍性、从区域性到全球性、从非政府间到政府间组织，几乎覆盖了政治、经济、文化、卫生、环境、人权、安全等与全球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各个领域。在国际社会组织化、国际行为集团化特征日益明显的当代国际社会，各类国际组织的存在与运行已经深深融入到世界各国的国际参与机制中。美国等世界主要国家都高度重视以国际组织为平台实现参与全球治理，实现本国的全球利益。迄今为止，世界主要经济组织规则均由发达国家主导制定。美国在世界贸易组织（WTO）、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WB）等重要国际组织中占有绝对主导地位。长期以来，世界银行行长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分别由美国人和欧洲联盟人占据。

虽然早在1971年10月，联大第2758号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但中国在相当一段时间内都是现行国际秩序的一般参与者而非主导者。在中国和平崛起的过程中，西方国家利用手中的国际规则和话语优势对中国进行了各种形式的遏制、抹黑和打压。当前，中国在国际组织中存在的代表性不足，任职人员数量少、职位低和影响力不够等问题越来越突显。据有关数据显示，当前联合国系统有中国籍雇员450人，占总人数的1%。其中供职联合国秘书处的非语言类中国籍专业人员只有74名，低于联合国给出的136个席位。这与中国当前所处的国际地位远不相称，也严重制约和影响了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进程。中国要有效参与全球治理，必须打通国际组织这一关键参与路径，增强规则制定能力、议程设置能力、舆论传播能力和统筹协调能力。

三、国际组织人才培养和输送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关键

国际组织人才匮乏是影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瓶颈所在。习近平主席指出，参与全球治理需要一大批熟悉党和国家方针政策、了解我国国情、具有全球视野、熟练运用外语、通晓国际规则、精通国际谈判的专业人才。这对高校培养国家急需的国际组织人才提出了重要战略任务，需要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加深认识和着力破解。

第一，国际组织人才就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人格化。作为世界秩序的坚定维护者和建设者，我们有责任也有义务为国际组织培养和输送具有中国核心价值观的全球治理人才。在人才培养过程中，要始终坚持把国家立场和民族情怀视

为立德树人的根本要求,解决好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一方面,要坚持全球视野,引导学生正确认识世界和中国发展大势、中国特色和国际比较,引导学生永葆中国底色,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深刻理解和把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另一方面,要引导学生正确认识时代责任和历史使命、远大抱负和脚踏实地,培育学生全球责任和担当意识,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和推动人类社会文明进步视为自身远大理想抱负和毕生事业。

第二,优化国际组织人才的知识结构和专业能力。早在1898年,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就开始着眼于国际事务人才培养,为美国参与全球事务提供了人才保障。我国高校现行的学科专业分类标准和人才培养模式,还不能适应国际组织对复合型人才的需要,有待高校积极探索和改革创新。由于英语作为全球通用语种的历史地位已经形成并固化,中国在国际组织人才培养中首先需格外重视语言能力的培养。具有坚实的外语能力也是毕业生从事国际组织工作的必然条件和基本要求。同时,国际组织又具有明显的领域性、专业性特征,这必然要求国际组织人才应具备扎实的专业能力和健全的知识结构,这就要求中国在国际组织人才培养中要承担语言和专业能力培养的双重成本。加快培养“外语+专业”或“专业+外语”的复合型专业人才势在必行。

第三,高度重视非通用语种战略人才培养。语言是一个国家和民族传承发展的最根本文化基因,蕴藏了丰富的历史文化、生活习俗、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随着全球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的迅速发展,全球力量对比正在发生悄然变革,诸多非通用语种国家和地区成为全球发展不可忽视的影响力量。中国全球战略利益也早已超

越传统的英语国家和地区,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非通用语种人才培养和输送需求更加迫切。加强非通用语种建设不仅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迫切需要,也是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必然要求。“9·11”事件后,美国把外语纳入更为重要的国家战略进行部署。出台了安全语言教育战略,着重加强对美国国家安全有着重要影响的外语建设。“国家安全语言计划”(NSLI, 2006)提出的“关键语言”语种包括了阿拉伯语、汉语、朝鲜语、俄语、印地语、日语、波斯语、土耳其语等。因此,我们应该从中国全球发展和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双重战略高度出发,加强非通用语种资源开发与利用,探索“外语+非通用语种”的复语型培养模式,向国际组织培养和输送一批能够胜任国际事务的关键外语人才。

第四,加大国际组织人才发展政策引导。当今世界,各国处于高度联结的共同体,全球范围内的贸易流动、资本流动已成为现代生产方式的常态。人才的全球性流动和从业亦成为必然趋势。按照联合国和有关人口普查的统计,中国的国际人口比例只有约0.04%。从全球平均水平来看,国际人口在全世界其他国家的比例是3%,发达国家是10%以上,发展中国家是1.6%,同为人口大国的印度,这一比例也达到0.6%。“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引才用才机制”“完善国际组织人才培养推送机制”是我们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重要任务。中国欲在国际组织中提升人才参与竞争力,须抓紧建立与国际接轨的人才发展政策和管理服务平台。应进一步加大国际组织人才发展的社会引导,树立优秀人才职业发展的全球就业观;坚持实践育人理念,大力推动学生赴国际组织开展岗位实习,拓展学生国际视野和国际交往能力;加强专门国际人才机构建设与交流,有力统筹国际国内的资源,更好地服务中国国际组织人才流动和发展

(责任编辑:赵雯)